

浙江省歸國華僑聯合會
浙江師大華僑華人研究中心

華僑華人研究論叢

主 編 周望森 副主編 吳 潮 趙向前

5

中國華僑出版社

浙江省归国华侨联合会 主 办
浙江师范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

华侨华人研究论丛

(第五辑)

主 编 周望森

副主编 ~~吴 瀚~~ 赵向前

中国华侨出版社

· 2001 年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侨华人研究论丛. 第5辑/周望森主编.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1.10

ISBN 7-80120-531-6

I. 华… II. 周… III. 华侨史学—文集
IV. D63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0179 号

● 华侨华人论丛(第五辑)

主 编/周望森

责任编辑/支惠琴

装帧设计/宋毅峰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张/7.75 字数/191 千

印 刷/北京永生印刷厂印刷

版 次/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300 册

书 号/ISBN7-80120-531-6/K·121

定 价/13.2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3 号楼 邮编 100029

E-mail: overseashq@sina.com

发行部:(010)64443051 传真:64443051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周望森

副 主 编 吴 潮 赵向前

常 务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毛 策 任幸芳 陈肖英 张乐初

张 兵 张忠祥 郑 崧 赵晓兰

郭剑波

特 约 编 委 吴飞飞

编辑部主任 郑 崧

目 录

浙江侨史侨情概述	周望森 (1)
三百年历史 十八万赤子	
——“海外青田人”散论(节选)	周望森 吴 潮 (16)
回顾与展望:温州与华侨的经济合作	蔡克骄 朱建仁 (45)
侨胞对家乡文成县玉壶镇的贡献	
——(《玉泉笔谈》节选)	余序整 (58)
青田中学校友出国述评	史 澄 (74)
1978 年以来海外移民与宁波社会经济的发展	任幸芳 (80)
引导与扶持 古城创佳绩	
——绍兴籍旅外同胞对绍兴社会发展的贡献	
..... 鲍尔青 李 舒 沈 真 陈迪宇	(86)
新马两地华教运动的互动关系	(香港)郑良树 (93)
南方有嘉木	
——马来西亚学者郑良树教授及其著作	谭家健 (107)
九十年代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的发展与挫折	郭 梁 (115)
华侨向海外传播茶文化的功绩	陶德臣 (133)
二战后印尼排华根源探究	张富军 (145)
试论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华文教育	丁 晓 (163)
在殖民统治环境下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试论香港苏浙同乡会及其办学理念	陈厥祥 卢美芬 (171)

华人网络的神话与现实 … (加拿大)李胜生 周添成 译(182)
新唐人街的发展:1965年后纽约市唐人街的变化 ……………
…………… (美国)安德烈·彼得逊 周添成 译 郑崧校(205)

圣保罗吴氏家族的经济实体

——《巴西青田籍华侨华人纪实》节选 …………… (巴西)郭秉强 (220)

“宁大北仑两难,相互为用乃可闯天下”

——省爱乡楷模赵安中的“宁大情结” …………… 孙善根(226)

毕生为侨务事业奋斗的人

——记旅荷华侨总会高级顾问胡志东先生 …………… 夏 雨(232)

情结:瓯江与多瑙河

——旅奥侨领郑同舟事迹新纪 …………… 史 澄(236)

浙江侨史侨情概述

周望森

浙江地处我国东海岸中段,濒临东海,与日本列岛、朝鲜半岛相望,与两地近距仅 500 海里左右。浙江有航海之利,早在远古时期,宁波就被称为“鄞”,就有人出海贸易,定居他乡了。据认为,秦代徐福奉命率童男童女东渡,就是从今慈溪达蓬山的秦渡庵启航的。南北朝时期,在日本被称为“汉织”、“吴织”(传播纺织技艺的技工的称呼)和“兄媛”、“弟媛”(传播缝纫技艺的师姐师妹)等“归化人”中,就有不少是浙江前去的。

濒海的区位优势 and 长期的出海经验,为唐代以后浙江人移居海外、产生一批批华侨提供了条件。现在,浙江已成为列于粤、闽、桂、琼之后的华侨大省,有华侨华人和旅居港澳人士约 120 万人,分布在五大洲 117 个国家和地区;归侨 3000 多人,侨眷约 100 万人。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中,浙江人出国形成了新高潮,新移民 50 万以上,是全国最多的省份。这个高潮目前仍呈强劲态势。这使浙籍华侨华人阵容大幅增扩,浙江的侨乡地位大为增强,华侨大省的优势更见突出。浙江的侨务工作任重道远,大有作为。

(一)

浙江华侨发展史上的各个阶段都有各自的显著特征,表现了

浙江华侨的个性。

〔古代浙江华侨〕

学术界有一种说法,华侨最早产生于唐朝。浙江华侨在唐朝已产生,与全国最早的地区同步。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台州开元寺僧思托随鉴真东渡日本,并定居不归。唐代宗宝应元年(762)越州(绍兴)浦阳折冲都尉沈惟岳受命护送日本遣唐使高元度返日,完成任务后“留而不归”,改了国籍,改姓“清海”,是有记载的最早日籍华人之一。资料显示,唐后期,浙江人赴日已出现了批量化情况,武宗会昌六年(846)明州(宁波)商人张支信与同行者共37人放洋赴日侨居16年,经营造船业,还当了唐通事。

古代浙江华侨出国的主要原因和他们的职业极有特点。一类是以佛教界人士为主的文化人,为弘扬佛法、传播中华文化、开展文化交流出国的;一类是商人出国经商。尚无破产农民、手工业者为谋生出国的情形。在第一类中以佛僧居多数。唐朝以降,浙江佛教兴盛,寺庙众多,高僧如云。与其他宗教一样,佛教也极具跨越地域推而广之的“张力”;而日本、高丽等国佛事兴起较中国为晚,尚无多宗多派的分野发孕,为溯源取经、寻宗弘法,文物之邦、佛教之乡的浙江被日本、高丽佛教界、文化界人士所看重,成为前来拜师取经、延聘高僧的首选地区之一。自鉴真、思托开先河之后,浙江前去日本弘法而定居的,宋代有兀庵普宁、兰溪道隆、大休正念、无学祖元等,元朝有明极楚俊、清拙正澄、一山一宁、西桐子昙、灵山道隐,清朝有东皋心越等等。旅日非宗教华侨也普遍信佛教,他们与宗教人士共同兴建了一批寺庙,长崎就有四座。这些寺庙的开山祖和住持都延聘国内高僧。其中的兴福寺,1620-1725年九代住持,便有六代来自浙江。教徒们的活动和寺庙的功能作用,对日本佛教的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日本天台宗以及创价学会、原道团等宗派的祖庭均是天台国清寺,都以天台佛法为本的,天台佛法乃至被誉为“日本文化之母”。

古代浙江另一类出国最多的是商人。浙江地理上的航海之利,经济的相对发达,工艺技术的先进性,对外发展贸易都有很大的优势。而明清时期屡屡实行海禁,民间商业界人士便寄希望于走私,这使浙江的以走私为主渠道的外贸反而趋向活跃,浙籍商人纷纷出洋,并且许多人难以回归,成为商业华侨。有记载或较知名的有唐朝明州(宁波)商人张支信等 37 人放洋到日本,有人定居下来。唐末越州(绍兴)商人周光瀚等先后以青瓷、越绫出口,并定居下来。此后,五代十国到两宋,出国人数增多,活动区域扩大到朝鲜、东南亚。从公元 935 年至 947 年间,先后有蒋承勋赴日,又有蒋袞、俞文秀、张文过等 100 人赴日;稍后胡兴逸到越南经商,后成为官吏,后代繁衍成为越南胡氏一大宗源,至 1400 年后裔胡季还建立了胡朝,成为国君。998 年温州人周仁旅居高丽,因受重用入仕,官至礼部尚书;1038 年明州商人陈亮、1047 年台州商人陈惟积也赴高丽(朝鲜)经商,次年台州商人徐赞等 17 人也赴朝,他们大多均有较长定居期。南宋永嘉人王德用、王德明兄弟赴交趾(现越南北部)经商,德用受国王“厚礼留之”;永嘉人薛氏则移居真腊(现柬埔寨)。明代留居海外的商人更多,清代也不少。浙籍侨商因经营得法致富者不少。被誉为日本“博多商人鼻祖”的杭州籍谢国明,13 世纪初(南宋时期)到博多从事贸易,曾向当地传授面条制作法,自身经营兴旺,成为日本华人首富。元代林净因(北宋杭州诗人林逋后裔)赴日定居奈良,以制售馒头为业,成为日本馒头始祖,天皇赐宫女为妻,至今日本人每年都有对他的祭祀仪式。

古代浙江华侨的去向和侨居地的分布具有高度集中的特征。大部分旅居日本,占 2/3 以上。其次是高丽,例如南宋绍兴九年(1139)七八月间有 4 批宋商共 327 人从明州出发去高丽;一些官员也到高丽定居,如朱熹曾孙、乌程县令朱潜于宋末流亡到高丽,为当今韩国朱姓祖源之一。从吴越国至清代,浙江人在高丽后裔

已达 15 万人,可查到的姓氏数十个。第三个去向是东南亚,而又以去越南为多。上述已举到几例。另有重要影响的是陈宜中的流亡,他是永嘉人,南宋末年宰相,为逃避元政权迫害,逃到交趾,复去暹罗,客死他乡。侨居东南亚的浙籍华侨也成了当地的一些族姓的祖源,如会稽峭唼阮氏,从元初至明中期都有人去越南,形成宗族化,明清时期他们多次派人到峭唼祭祖。

浙江人在清初已有去欧洲侨居的说法,就是一些青田人在康熙年间(十七、十八世纪之交)经西伯利亚到西欧贩销石制品(后详)。这样看来,古代后期浙籍华侨分布已有一定的广泛性,广泛中有集中。

[近代浙江华侨]

进入近代,世界移民风潮汹涌澎湃,中国移民占世界移民总数的 1/10,约 1000 万人。近代中国移民绝大多数是西方早期资本主义国家以掠夺、拐骗为手段的“契约华工”(又称“猪仔贸易”)。宁波是华工出国口岸之一,1847 年(道光二十七年)有陈义、张福等一批人被从宁波运送到古巴当苦力;西方殖民主义者在 1855 年(咸丰五年)从宁波等地骗得女青年 47 人送往古巴为奴;1859 年上海、宁波等地 208 名华工出国到西印度群岛的瓜德罗普从事劳务。除上述几例外,浙江极少有其他契约华工批量出国的记载了。契约华工数量少,是浙江近代移民不同于闽粤等省的一大特点,也是浙江近代华工华侨队伍不大的主要历史原因。“猪仔贸易”以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英法俄三国来华招募赴欧作战事后方服役的劳工,总数 20 多万人中约有 2000 名青田人。这是有史以来浙江最大批量的移民出国。除华工外,近代浙江人出国还有以下三个渠道:首先是始于古代(康熙年间)的青田石商出国流在近代得到延续,并逐渐扩大。据说,“在 17、18 世纪间,就有少数国人循陆路经西伯利亚前往欧洲经商,初期前往者以浙江青田籍人为多,贩卖青田石制品。”对此说,至今尚未得到全面考实论证,但可能

性是存在的。青田盛产的叶腊石是润柔的特质石材,施以镂空、俏色利用的特殊技艺,有巧夺天工之美。青田石雕技艺至清初已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作品从内销转为出口外销完全在情理之中,已查个例最早的是清嘉庆三年(1798)该县山口镇陈半山人留国云东渡日本销售石制品。道光年间(1842年左右)已有青田人在彼得堡、明斯克一带做工(章旦乡的留庆云为其中之一),极有可能是先携带石雕销售,告罄后再打工的。同治三年(1865)青田方山人杨灿勋和光绪二年(1876)山口乡林茂川、林茂祥分别去英国、法国和美国销售石雕。1870(同治八年)苏伊士运河开通,青田人对此十分庆幸,再也不必绕道好望角去西欧了,只须经红海穿越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在意大利、法国口岸登陆就可以转徙中西欧各国。这就激起了青田人的出国热,赴欧如履坦途。受青田人出国的影响和提携,文成、瑞安、永嘉直至鹿城等地的青田毗邻地带的民众也陆续出国。至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前期,中国传统农业、手工业进一步衰败,军阀统治更加黑暗,人们不能聊生,纷纷飘洋过海,浙南人掀起了第一次出国高潮。青田人在海外最多时约达30000人,整个浙南华侨不少于50000。

第二个出国渠道是宁波、舟山及其他地区的海员、商人出国。宁波在鸦片战争后被列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航运业、外贸业在新条件下得到发展,海员和商人队伍扩大。在开展对外业务活动中海员、商人留居海外谋生和发展的应运出现,并带动家乡其他人出国。宁波近代较早的华侨队伍就是由大碇的几名海员滞留香港(再转外)、日本而形成的,其他地区的也属此种情形,如嘉兴海盐澉浦等。

第三,留学不归者是近代华侨形成的又一渠道。近代浙江整体文化教育水准处全国前列,学子留学海外也居于先进。例如第一批留美童子120人中浙江籍8人,以后留欧留日生浙籍人士所占比重一直都居前列。留学人员中产生了一批高素质的华侨精英

分子,钱学森、钱三强等等即其例。

近代浙江华侨分布的特点是:走出了亚洲,远涉欧美,从古代旅居东北亚、东南亚的不足 10 个国家和地区,扩大到近代 40 多个国家。这个时期的前期,日本是浙籍华侨的最大侨居国,仅日本关东地区,被日本排华势力借故一次杀害的温州、青田华侨就达 700 人,遣返回国的 4400 多人。经过这次疯狂的排华暴行和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不断扩大,浙江民众移居日本急剧收缩,向东南亚移民增多,而重点是移居欧洲。这一分布格局一直延续到今天,欧洲是浙籍华侨的“重镇”。

近代浙籍华侨的职业相对于他们古代先辈,就不那么单纯而趋向多样化了。除少数人搞进出口贸易外,大多数人是掣卖零售业、泥木手工业,到这个时期的后期有了一定数量的餐饮业、皮革业、制衣业。以留学人员为主的知识人员从事各类科技、文化事业。但总的来看,浙籍华侨几乎没有从事第一、二产业的,绝大部分是服务性行业,所以一直没有开发性、创大业的产业大户,连中产阶层也未形成,只有为数很少的“小康”之家。

[现当代浙江华侨]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退往台湾的国民党党政军人员、上层文化界和工商界人士中,浙籍人士约 19 万;以“宁波帮”为主的浙籍工商界等人士前去香港、澳门定居发展也不少于此数字。这两地的浙籍人士及其后裔中一部分人先后转徙欧美等地区,成了华侨。“两转侨”的人数不得而知,但却是本时期前期浙籍移民海外的主要源流。

改革开放前,大陆移民海外困难很大,国内严卡,国外严拒,只有为数很少的人被批准出国探亲团聚、继承财产,并取得道香港、澳门才有可能出境。青田县申请者五十年代平均每年上百人,能批准出国的只有 1/10,总计只有 152 人;此后的 1960—1976 年共批准出国 215 人,改革开放前青田全县出国总计 367 人,而整个温州

市也只有数千人。这种情况犹如涓涓细流,仅反映这些传统侨乡移民海外尚未“断流”。

改革开放后,侨乡人率先“走向世界”。经过 80 年代的发展,90 年代掀起空前的移民高潮,它来势猛,规模大,人数多。从 1977 年至 1999 年,全省新移民达 50 万,居全国各省市之首。海外新华侨人数的增多,大大加强了浙江的侨乡地位,在全国排名从 80 年代的第 9 位跃升至第 5 位。到 2000 年上半年,全省华侨华人 80 余万,连同港澳同胞约 120 万人。

浙江华侨的移出地(本源)和海外分布区域(流向)的又广泛又集中的特征继续加强。浙南地区的华侨多达 50 多万,占全省新华侨 80% 以上;浙籍新华侨的分布也十分集中,欧洲约 50 万人,又占 80% 以上;美洲约占 15%,近 20 万人,其中美国约 15 万人。高度集中于欧美的这种分布特征,造成了一种区位优势。这两个世界最发达的地区,是我国对外开放、外交事务的重点地区;在这两个地区的浙籍爱国侨胞在政治舞台上颇为活跃,他们与欧盟、与各国政府开展了对话,开展“民间外交”,开展反霸反强权反干涉的斗争,维护了中国、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利益,对我国政府的外交工作起了一定的配合和补充作用。

随着我国政府不承认双重国籍的政策出台,建国以来,大批华侨加入当地国籍,成为外籍华人。据认为,海外侨胞已有 90% 以上转变成了华人。但浙江籍侨胞改籍的人数并未达到这个比例,不超过 50%,原因主要是浙籍侨胞中新华侨人数大大多于老华侨,有不少人是 90 年代以来才出国的,缺乏加入当地国籍的资格;其次,浙江籍尤其是浙南籍侨胞文化程度欠高。文化程度不高,比种族、语言的隔阂更不利于融入主流社会。此外,浙籍侨胞面对的是欧美的与自己在人种、文化上差异悬殊的民族,不若粤闽等省侨胞的大部分人面对的是东南亚的与中华民族差异小得多的民族。

现当代海外浙江人的职业结构、产业结构、经济实力,有了重

大变化和发展。(一)由国内宁波帮(含舟山籍)等由工商界人士转化来的海外华侨华人、港澳人士的经济,走向现代化、规模化、集团化,成了工商巨子,在住在国(地区)具有举足轻重的经济地位。在世界级的10名华人首富中浙籍人士有2人,香港10大首富中宁波帮有3人,在美国10大华人财团中宁波籍有1人,在巴西华人首富中浙籍1人。在各行业中不少浙籍人被誉称“大王”。如“船王”包玉刚、董浩云,“影视大王”邵逸夫,“春卷大王”范岁久、“大豆——石化大王”林训明、“香港电子大王”邵炎忠等等。(二)一大批以留学人员和海外青年华侨中的高学历者构成的高素质科技人才群在经济领域崛起,成为“知识经济”生力军。例如朱艺峰(旅美),周松波(旅德)、周海平(旅法),杨杰(旅美)等等,或创办高科技经济实体,或在跨国集团(公司)任高级职员(总经理、总代理等等),经济地位和实力正在迅速上升。(三)以往的浙南籍的青一色小商贩已经消失,他们被后代的以餐饮业、皮革业、服装业为主的多样化经济所代替。其中已有1/10的人成为业主,部分人上升到中产阶层。但是由于浙籍海外侨胞大多数旅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缺乏充分的开发创业余地,二十世纪里大多数人的经济能力仅能满足生存、不能致富。(四)新华侨展拓的外贸业崛起。二十世纪90年代,为数众多的青田人(约3万)和温州人(数万计)向东欧、巴尔干地区、巴西等国家以及非洲部分国家开展十分活跃的出口贸易活动,商品经济发达的温州、义乌等地的企业主(以个私企业主为主)到南非、东南亚国家开设企业和商品城,这两类浙江人的大多数都获得成功,不少人迅速致富,成了拥有数百万、数千万资产的实业家;大多数从事外贸的人员都长期定居国外,设立企业和商城的人员中也有部分定居海外,这都成了新形态下的经济水平较高的华侨群。从以上四个方面可知,二十世纪后半期浙籍海外侨胞的经济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实力和地位已大为上升。

(二)

在旧中国,华侨远离家乡,又加当时国家贫弱,政治腐败,国际地位低下,华侨受外部歧视欺凌而得不到保护,是为“海外孤儿”。但血浓于水。海外侨胞以血缘地缘关系和文化认同凝聚结合,互助互济,求生存,图发展。这种生存方式和文化特征,使得异乡的侨胞形成自己的社区,称之为“唐人街”、“华埠”、“中国城”等。浙籍华侨的唐人街古就有之,近代有了发展,现当代趋向普遍化。例如,宋时日本福冈(博多)的浙籍华侨与兄弟省籍华侨聚居的唐人街曾十分繁华;二十世纪前期以青田籍侨商为主的巴黎里昂车站附近的两条小巷“白玉洛”和“拉奇诺”是近代的唐人街;而纽约法拉盛等处和巴黎第三区、十三区、十九区的“温州街”(含青田籍)则是现当代的唐人街。在欧美其他不少大城市都有浙籍侨胞的唐人街了。唐人街,既是华侨生活集居地,也是海外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

海外侨胞还普遍结社建团,以适应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事业发展的需要。这就是华侨华人社团,简称侨团。早期浙籍的侨团大多是与兄弟省籍侨胞同体的社团,最早出现于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而后多出现于日韩。1807年越南的七府公所就是包括宁波侨胞的社团;1867年成立的日本横滨中华公所(1871年改为“中华会馆”),1884年5月的汉城中华会馆、1899年的汉城中华商会等等,则浙籍人士颇多。稍后长崎、函馆、大阪等地也先后建立了浙籍人士为骨干的或占多数的侨团。此后还产生了不少革命性质的和以爱国主义为旗帜的社团,在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革命中,旅日浙籍人士和留学生或单独或与兄弟省籍人士先后建立了励志会(1900)、浙江同乡会(1903)等等,其中的许多成员都接受孙中山革命思想,他们成为光复会和同盟会的成员和领袖人物,对行将到来的辛亥革命和反袁护法斗争起了重大作用。辛亥革命以

后至抗日战争前,在不少国家都建立了浙江人独立的或与外省籍同体的地缘性侨团,他们大多是宁波、温州和青田的侨胞。例如留日宁波同乡会(1922年)、新加坡的温州木器工友联合会(1922年)等等。接着在欧洲出现了浙籍的以业缘为主的侨团。最早当推绍兴籍蔡元培等于1916年创建的中国赴法勤工俭学会和华法教育会。1917年创建的旅俄华工联合会则有不少青田商贩加入。1920年青田籍王志南等与广东籍侨胞建立了荷兰会馆,1920年宁波籍陈纪林在德国汉堡创建水手馆,1929年改为中华会馆。二十世纪30年代日本加剧扩大侵华,民族危机加深,侨胞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于是大批以抗日救国为宗旨的侨团在德、法、荷、新、马、菲、印尼、巴西等国家(地区)纷纷建立。建立在德国的“反帝大同盟”、第一个全欧性的侨团“全欧华侨抗日联合会”(1936年9月20日建于巴黎),都有大批浙籍人士加入并成为骨干。其他各国各地以浙籍侨胞为主体或有大批成员的抗日侨团,达20多个。“二战”结束后,大批侨胞归国,抗日侨团自动消散。战后建立的浙籍人士侨团最早的有钱三强等创办的法国和平促进会(1945年底),周祥庸任会长的东京华侨总会(1946年5月),马来西亚檳城温州同乡会(1946年),意大利米兰华侨华人工商会(1946年8月),余忠任会长的荷兰瓯海同乡会(1947年11月,现名荷兰华侨总会)等等。从1949年至70年代后期,由于华侨人数很少增加,新侨团也很少出现,较著名的是杨岳任会长的旅法华侨工商互助会(1949年,先后改名为旅法华侨俱乐部、法国华侨华人会),陈顺庆创办的汉堡海员之家(1962年),潘岩法任会长的留日华侨浙江同乡会(1968年2月),吴仙标任首届会长的美华协会(1973年),美东(纽约)温州同乡会(1977年2月)等等。改革开放后,随着华侨人数的迅速增加,华侨经济实力的增强,华侨与国内的联系交往空前密切,建立社团也日显重要。90年代创建侨团呈雨后春笋之势,尤其是欧洲的浙籍侨团骤增近百个。例如西班牙华侨华人

协会(1983年)、葡萄牙华侨华人协会(1990年)、荷兰皇家饮食业公会(1985年)、奥地利华人总会(1991年)、法华工商联合会(1993年)、欧洲青田同乡会(1996年)、旅德浙江华人联合总会(1998年)、英国浙江联谊会、旅匈华人联合总会(1992年)、意大利华侨华人友好协商会(1994年)等等。最有影响的是1992年5月建立的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主要创建人、前8届(至2000年)主席中的6届都是浙江人,加入该联合会的各国侨团和历届理事会成员的大多数也是浙籍的。这个全欧洲的大型跨国侨团在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促进祖国统一、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尊严、支援祖国现代化建设与欧盟对话、维护侨胞权益、开展中外交流合作等等方面都有自己的严正态度,采取积极步骤,做了许多工作。特别是反对分裂祖国搞台独、反对北约轰炸我驻南大使馆及庆祝香港、澳门回归等方面开展的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

海外侨胞情系中华,爱国爱乡,他们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力量与资源宝库。

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中,华侨起了重大作用。1903年浙籍留日同乡会的许寿裳、孙翼芳、马君武等人就创办了著名的反清革命刊物《浙江潮》。孙中山在日本创建兴中会、同盟会,大批浙籍人士加入,成为骨干和领袖人物,浙江籍侨胞还创建了革命团体光复会。仅绍兴籍就有秋瑾、陶成章、朱执信、汪精卫、沈钧业、蒋尊簋、王金发等,其他有余杭章太炎、湖州陈英士、戴季陶、吴鼎昌、慈溪吴锦堂、昌化方殿华、平湖李叔同等等;在法国等欧洲国家,仅湖州籍即有张静江、褚民谊、周柏年等与孙中山直接结交,也加入同盟会成了领袖人物,张静江还以巨资支援孙中山革命,他的通运公司则是同盟会的联络点和革命场所。以上的和其他的大批浙籍海外人士在辛亥革命后又跟随孙中山开展反对袁世凯的卖国复辟斗